

◎ 牧 惠 /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小报告以外



❖ 野蒺藜丛书

牧 惠 / 主编

◎ 牧 惠 著

小报告 以外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报告以外/牧惠著.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12

(野蒺藜丛书/牧惠主编)

ISBN 7-215-04760-1

I. 小… II. 牧… III. 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文集 IV. D262.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43290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73号)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5 字数 201千字

2000年12月第1版 200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 000册

定价:13.50元

“野蒺藜丛书”总序

从某种意义上说,咱们的文学创作确有点“百花齐放”的样子,什么先锋小说家啦,新生代啦,晚生代啦,后现代啦,实验小说啦,以至新新人类啦……让我们这些落伍者眼花缭乱得连名字也来不及记住。相当一批作品,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离床、性、钱越来越近。是非功过难以论定;但是,有一点却是不争的事实:在各种文艺体裁中,杂文是虽有变化却很难远离现实。“新基调”杂文仍有;它们或不痛不痒,或涂脂抹粉,那背景又仍是现实生活的喜怒哀乐。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一辑“野蒺藜丛书”,其中共同的特色就是依然保持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深切关怀和思考而伴生的艺术激情。

仅以我们六人当中的老大哥冯英子先生为例。这些年来,英子先生可以说是对日本军国主义有着深仇大恨,没齿难忘。一有风吹草动,马上拍案而起,予以声讨。我们在打算编这套丛书的时候,马上想到他,而且指定他就这个主题编出一本杂文集来。因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咱们中国每一个家庭都有过程度不同的直接或间接的伤害,因为他们总是赖账,总是拒绝忏悔。还因为——真是不好意思,我们当中有些人出于各种原因产生了一种以德报怨的健忘症,一种装聋作哑病和软骨症。我们希望英子先生的这些文章,包括那封致日本首相的公开信,能对这

种毛病有些疗效。

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考虑,出杂文集大致不会让出版社亏本而略有微利,但远不如什么名人的畅销书那样一本书就创造近千万元的经济效益,为“经济增长尽了绵薄之力”,也不会有人盗版。皮尔·卡丹或李宁才不会傻乎乎让我们去签名售书给他们当“托儿”。我们只是尽本分。

蒺藜,一年生草本植物,开黄色小花,果皮有尖刺。种子入药,有滋补作用。我以为用来命名丛书,恰当不过,虽有刺,但有花,滋补,这就够了。

牧 惠

2000年6月17日

题 记

肖斯塔科维奇《见证》中有一句话：“契诃夫常说，除了揭发信以外，他什么都写。我和他的看法一样。”

肖斯塔科维奇说这句话，为的是回答一个问题：他是凭着什么逃脱斯大林的大清洗而活下来的？他说：“我想原因是那些电影。”肖斯塔科维奇在他的创作生活中不断为电影配曲，其中包括把他并不喜欢的斯大林描绘成英明、勇敢的领袖，很让斯大林喜欢的《攻克柏林》和《难忘的1919》之类片子，并因此得奖。但是，他从来没有写过揭发信。

揭发信，在我们这里比较恰切的叫法是小报告。契诃夫是一位不朽的小说家，肖斯塔科维奇的艺术成就也是有口皆碑。在这方面，我不敢也不可能同他们作什么攀比。但是，在这几十年中，我写过小说，诗歌，散文，评论，政治经济学论文……更写过不少检讨、认罪书，其中散布过不少现在想起来十分羞愧的错误思想，惟独没有写（打）过小报告。在这一点上，我还是有条件跟在他们后面这样说的。

读肖斯塔科维奇这段话时，我画上了一道红线，而且有了这个念头：下一次出杂文集，那书名就定为《小报告以外》。

牧 惠

1999年9月9日

目 录

题记	(1)
一个被遗忘的口号	(1)
贾长萍的悲剧	(4)
谦虚未必有助进步	(6)
中法文字狱观之异同	(9)
败兴有罪	(12)
信任危机	(14)
“刁民”问题的问题	(17)
爱“社”小偷	(20)
打麻雀的教训	(22)
救救孩子	(24)
“无差别境界”?	(26)
还说面子	(30)
民主在前进	(32)
超前者的悲剧	(34)
“惟恐天下不乱”说	(37)
从文人无行到无行文人	(40)
仕而优则学	(43)
巴金重上战场	(46)
《随想录》的华盖运	(48)

冯雪峰的双重悲剧	(55)
为徐懋庸一辩	(62)
从《哀吴晗》到《维民所止》	(66)
声讨“鬣狗”引起的反击	(71)
要振奋,但不要瞒和骗	(74)
“干部决定一切”的背景	(77)
谈谈政变经	(80)
季玛舒克现象	(82)
谈农民	(85)
假话症	(88)
不是劝世文	(90)
读《梅次集》	(91)
说声势	(93)
抵食	(95)
提倡与禁止之间	(97)
真假反贪	(99)
抄书一段	(101)
从买官进步到买选票	(103)
各有所吃	(105)
又一块答丢夫手帕	(107)
愚公后传	(109)
是悲剧,不是游戏	(112)
自愿不自由	(115)
“非抓不可”	(118)
另一种“剖腹早产”	(120)
一段趣闻	(122)
说长论短	(124)
拍卖“四荒”的余悸	(126)

见义勇为罚	(129)
“三分之二”以外	(131)
孟母三迁新说	(134)
奇闻引出的奇闻	(136)
未必都是洪承畴	(139)
求教于雷池月先生	(142)
也谈“小款”	(147)
妙格瓦拉	(149)
另一种反“向钱看”	(151)
说“舆论导向”	(154)
陈布雷之死	(157)
这不就是牛二?	(159)
死亡崇拜	(162)
谬奖啦! 张金柱	(165)
尚有危害烈于假酒者	(167)
学雷锋也得送红包?	(169)
八七五十四	(172)
“处女膜修复”之忧	(174)
时代呼唤果戈理	(176)
斟酌《斟酌》	(179)
笑说“署名权”	(182)
令人玩味的心态	(184)
必也正名乎	(187)
凤霞真的走了?	(191)
降低反贪成本	(194)
来一个“爱民月”如何?	(196)
谈国耻纪念日	(199)
对记者的厚望	(201)

也谈“粗暴”	(203)
爷卖孙田心痛不?	(207)
这块石头该摸不?	(210)
前程远大新艺术	(212)
莫洛托夫谈按劳分配	(215)
习惯	(217)
扎根串连	(222)
愿智慧不再痛苦	(225)
他乡? 故乡?	(228)
姑且算是考证	(230)
拉斯普京风气	(233)
《思痛录》出版之后	(235)
为《思痛录》说几句话	(238)
形迹可疑的“内幕”	(240)
怎样看萨达姆?	(243)
该出手时不出手	(246)
可怕的麻木	(249)
多乎哉? 不多也	(252)
狼狈的克林顿	(255)
《思忆文丛》引起的思忆	(258)
智者作法,愚者守法?	(261)

一个被遗忘的口号

深圳工厂又一次火灾,大火吞噬了 84 条民工的生命。

由是,我突然想起有关“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这句“最高指示”的一段往事。

“文革”当中,学校、机关派性斗争严重,于是提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派工宣队进驻学校、机关。姚文元写了一篇大文章在《红旗》发表,阐述这段“最高指示”。有读者写信到编辑部提出异议。大意说,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通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来实现领导阶级的作用,用工宣队来代替党组织不对。我当时以“戴罪之身”分配拆阅信稿并分发给有关部门。这封信的意见,多少有点与我对进驻的工宣队水平极低的感觉相符,但是又与当时党组织已全部“休克”的现实对不上号。我以为此信可以供写评论的人参考,于是转给他们。结果得了一个“包庇反革命”罪。理由很简单,此人反对“最高指示”,理应把信转到公安部门捉拿法办。我于是照办了。这位作者下场如何不得而知。恐怕不死也得掉层皮吧!

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除了“工农联盟”这个词极少见到之外,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一词也久违得很,更不必说领导一切了。这回深圳葵涌镇致丽玩具厂因火灾而烧死工人,并不是第一次。我记得,至少前两年东莞也有过一次同样造成严重后果的火灾。两次火灾都死了那么多人,直接原因是工厂主根本

不把工人的死活放在心里,而是把他们当成必须防范的假想贼。东莞的工人是被锁在工厂里活活烧死或被火所迫跳楼而死的。致丽厂呢?记者见到的情况是:该厂房二、三层的东面各有一个疏散楼梯,但工厂却将东面楼梯用拉闸门上锁封死,只留西面楼梯出入。这楼梯有一个约两米宽的门直通楼外,但也用拉闸门锁死。这样,二、三层的工人只能从一层的车间出入,而一层的四个出口又有三个已上锁。当大火发生后,一层的车间里早已是一片火海,从二、三层冲下来的工人进退不得,绝大部分被浓烟窒息倒在了楼梯间。此外,起火的厂房所有的窗户不但装了铁条,还加了一层铁网,车间的通道上又堆满了大量的海绵、布料、杂物等等,整个车间里的工人就成了笼中之鸟,想逃也逃不掉!

合营厂的香港一方无疑是资本家,他们企图使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种种野蛮手段对待工人,可以说是意料中事。即使如此,香港的资产阶级报纸也给这种资本家以猛烈的抨击。奇怪的却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所领导的当地政府官员的态度。记者说,去年3月及“八·五”大爆炸之后,深圳市政府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消防安全大检查,共向6000多家企业发出整改通知,但收效甚微。某些检查部门发了整改通知就撒手不管。某些企业心存侥幸、阳奉阴违,根本没把整改放在眼内。起火的致丽玩具厂,3月份被检出违反消防安全规定共13项,但到5月份,该厂仅纠正了其中6项,便获得《消防合格证》。为什么那么容易“合格”,其中的“猫腻”,咱们蛮可以猜出个七八。火灾发生后,该镇宣传部长竟宣称拒绝一切记者采访,这个宣传部究竟是哪一党的宣传部,十分可疑。

虽然由不得我做主,那封被定为“现反”的读者来信却是由我经手(当时叫赎罪)转公安部门的。想起这件事,今天仍然愧疚且悔。让那些工厂的学徒来教我们这些入党十几年、几十年

的共产党员跳“忠字舞”也算“领导”，那诚然是一种嘲弄。但是，反其道而行之到致丽厂这个地步，其罪过比那位写读者来信的“现反”又如何呢？

1994年1月27日

贾长萍的悲剧

60年前,上海《申报》馆英文译员秦理斋的未亡人龚尹霞,为了让子女留在上海读书等原因,不能按公公的要求回无锡农村,经公公多次严厉催逼,她只好同三个儿女一起服毒自杀。

60年后的今天,河南商丘郭村镇一位先进工作者和模范班主任贾长萍,为了儿子能跟自己一起达到“农转非”的目的,毒杀孙女和儿媳。

对于秦理斋夫人的行为,鲁迅在一片诛伐声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秦夫人是被以她公公为代表的封建势力逼死的。“我们固然未始不可责以奋斗,但黑暗的吞噬之力,往往胜于孤军……穷乡僻壤或都会中,孤儿寡妇,贫女劳人之顺命而死,或虽然抗命,而终于不得不死者何限,但曾经上谁的口,动谁的心呢?”

今天,我们诚然应当声讨这位杀人凶犯。贾长萍比秦理斋夫人更残忍。可是,据记者介绍,贾长萍曾是一位很好的教师。22年来,这位民办教师把整个身心都扑在教育事业上,刻苦钻研本职工作,所带的班级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全镇各小学前茅,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模范班主任。也就是因此,她得以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农转非”愿望。可是,她听说只有未婚子女才可随母亲“农转非”,而自己的儿子早已结婚,并且有了一个八个月的孙女,她于是陷入了深深的懊恼中。为了不错过这次机会,她铤而走险,产生了杀死孙女和儿

媳的惡念并付诸實施,于是成了殺人凶手。

不知道賈長萍的“聽說”是否準確。但是,當年成千上萬的知青返城的時候,不少人為了能夠完成這一“農轉非”過程而離婚却是活生生的事實。因離婚不成而“此恨綿綿無絕期”的也是事實。

不必解釋,人們也會懂得“農轉非”對一位有農村戶口的人意味着什麼。那是《天網》里那位奮鬥了將近二十年、眼睛幾乎瞎了的民办教師仍不敢奢望的天堂境界。為了“農轉非”,如果可以花錢買戶口,銀行馬上擠滿了取款的長龍;不可以公開買,人們不惜出重金走后門因而“腐蝕”出一批貪污犯。因此,在討伐賈長萍的時候,恐怕也得如魯迅對待秦理齋夫人事件那樣,從另一方面考察吧?。

前些時到外地同幾位朋友聊天,談到農民的生活,談到剪刀差(他們現在已稱之為火鉗差),談到城鄉差別的擴大(手頭上剛好有一份《中國經營報》的材料,1992年,全國職工人均年工資2711元,農民平均年收入784元;城鄉居民收入差距1991年為2.1倍,1992年擴到2.5倍。如果城市居民收入中加上各種福利補貼,農民收入扣除各種額外負擔,實際差距為4倍),談到在某些“土皇帝”統治下農民的無權狀態,一位朋友很有感慨地說,不知道是否同梁漱溟的“批倒批臭”有關,這些年已經沒有人提“工农聯盟”這幾個字了。從鄉村轉到城市,“農轉非”只不過仅仅迈出那麼一小步,却使得一位模範教師喪失了理智。這出悲劇的後面說明了什麼?

當然,話得全面說,也有像珠江三角洲那樣,想“非轉農”亦不易的。

1994年2月16日

谦虚未必有助进步

众所周知的文坛登龙术之一,就是编写诸如《文艺年鉴》、《文学家大辞典》或什么(如小说、诗歌、散文、杂文)《鉴赏词典》之类,把自己和自己这一伙都编将进去。近月来上海一些报刊对《语言大典》的批评,其中就包括把一些根本不知名的张三李四也巧妙地收入词典这一条。去年在四川开杂文研讨会,同马识途老先生谈起一本以杂文为名的词典,马老很不高兴地说,他被该词典聘为顾问,原先也说要收他的杂文;出版后词典中收了许多不怎样的杂文,有的人还不止一篇,他的杂文却一篇也没有入选。我说,你保留顾问头衔不选文章,我的顾问衔被抹掉却选了一篇,这大概属于对“统战对象”平衡照顾的考虑。

也是为了“团结为重”,我格外宽大地被赐予一本。(据说被收入杂文者,不仅不付给稿费,连样书也不给,不知道这与出版法有无干碍?类似的事见多了,也不以为怪,难怪一次版权局的女士批评我吃了大亏还蒙在鼓里)当然首先关心的是自己,对鄙人的介绍,林文山竟是牧惠的笔名。曾记得有一位顾问在评介此书时,对他的小传搞错提出了意见,可见不止一人一处搞错。

当然,林文山的笔名是牧惠,或牧惠的笔名是林文山,纯属小事一桩。何况我本来还有一个父亲起的名字。“林文山”三字是打游击时为了给交粮、交税的人打收条盖章而临时凑出来的。同宋江在清风寨时被刘高抓住时自称张三一样性质,只不过宋

江的把戏被拆穿,当不成张三,而“林文山”却一直沿用下来罢了。说它是笔名,也有点接近。问题是诚如马老所说,不止马老,还有若干知名的、有成就的杂文家并无一篇杂文选入。连汉奸周作人也可以入“典”,而且选了三文,马识途(还有别的不一一列举)却一文也不准选入,是不是他们比汉奸更坏?还是另有标准?

再翻到后面的《杂文文论篇目索引》,我首先比较关心的是1957年打“右派”时的篇目,发现即使在当时比较突出的徐懋庸问题上,也有不少有意无意的遗漏。徐懋庸以回春的笔名发表了《小品文的新危机》后,先是焦勇夫、严秀、范舟等人参加讨论,反右派号角一响,马上组织了对徐懋庸(祸及讨论者)的毁灭性打击。这当中,北京有关锋,上海有姚文元,其中还有包括庄农等人的讨伐。现在的索引,可说是挂一漏万。关锋那篇收入了却没列入同样重要的姚文元《徐懋庸提倡的是什么“小品文”?——批判徐懋庸杂文之七》,也没列入庄农《对凶手的考察》,还没列入……根据这条线索,我发现一条不成文的规律:碰到类似问题时,“自己人”显得过分谦虚,庄农、阮延顺、葛德等人的这类文章全没有编入《索引》。1950年黄裳发表《杂文复兴》后,引起在这本辞典里称为“上海各报刊开展关于杂文问题的讨论”。据黄裳介绍,那其实是一场只准黄裳检讨的批判。对于这场建国以后对杂文的头一次讨伐,《索引》仅收了四篇文章,据我所知远不止这些。1958年,“再批判”王实味、丁玲、萧军,作家出版社出了两本批判文集,《索引》都全部略去。1942年在延安和1946年在东北对上述人的批判,在《索引》中同样不留下任何痕迹。这些在杂文史、杂文理论中起重要作用的篇目的省略,编者人或有自己的苦衷,或加上自己的谦虚;但是,这样的《辞典》,参考价值十分可疑。听说这本印了上万册的《辞典》将要再版。能不能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恢复历史本来面目,作一番修订